

# 《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

##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

13位ISBN编号：9787303101845

出版时间：2015-2

作者：桑兵

页数：36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http://www.tushu111.com)

# 《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

## 内容概要

相对于国际上汗牛充栋的拿破仑研究，孙中山学还有很多谜底有待揭晓。

透过孙中山，关注孙中山周围的陈炯明、戴季陶、胡适诸人，可谓连成一片，满目桑田。

人物研究的曲曲折折，个案与事件层层推进。

孙中山是近代中国史上的枢纽式人物，经验与智慧超凡脱俗，为人行事往往逸出常轨；其活动与思想能够勾连同时代的大事要人，对研究者的见识与功力极具考验。作者在深入梳理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以实证虚，通过了解孙中山周围的人事及其内在联系，具体掌握其每一言行的殊境、思维、潜意识甚至无意识，力求达到了解之同情的境界。

# 《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

## 作者简介

桑兵，河北威县人，历史学博士。历任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任中山大学逸仙学者讲座教授。出版《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等专著。主编《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及同名丛书、《清代稿钞本》。合编《戴季陶集》、《近代中国学术批评》、《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国学的历史》、《读书法》。

## 书籍目录

绪论

上编

孙中山与庚子勤王运动

一 兴汉会与自立军

二 兴中会与保皇会

三 革命与革政

四 余论

庚子孙中山上书港督卜力述论

一 问题的提出

二 两广独立

三 拟定与递交

四 宗旨与策略

孙中山生平活动史实补正（1895——1905年）

——《孙中山年谱长编》编辑札记

一 澄清史实

二 补正细节

三 资料与问题

孙中山与同盟会的成立

一 舍弃兴中会？

二 全国领袖

三 旧说新解

同盟会成立时孙中山的政治形象

一 文化英雄

二 统一与反满

三 天下为公

孙中山与新加坡华侨

一 早期联系

二 《图南日报》

三 建立同盟分会

四 革命大本营

五 拥护共和

胡适与孙中山

——从新文化运动到国民革命

一 新文化的同路人

二 善后会议

三 国民革命

陈炯明事变前后的胡适与孙中山

一 接近孙“系”

二 统一与分治

三 苏俄与中共

四 依然同道

下编

孙中山革命程序论的演变

一 缩以约法

二 共和与专制

三 革命方略

四 约法与《临时约法》

五 由约法而训政

六 始终不渝

孙中山与传统文化

一 语言工具

二 偏好史地

三 信而不泥

信仰的理想主义与策略的实用主义

——孙中山的政治性格特征

一 政治性格的两重性

二 两重性的适度

孙中山的国际观与亚洲观

一 强国取向

二 本位中心

三 济弱扶倾

辛亥前后戴季陶的日本观

一 了解与警惕

二 头号大敌

三 揆转潜因

《戴季陶文集》与戴季陶研究

一 戴季陶其人

二 文集的编辑

三 日本观

再版后记

人名索引

征引书目

一 著述文献

二 报刊

三 档案

# 《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

## 精彩短评

- 1、#1866/11/12-2016/11/12 纪念孙中山先生150周年诞辰# “孙中山这类人物，时间跨度大，经历事件多，交往联系广，又兼具政治家、思想家等多种品格，经验与智慧均为常人所不及，为人行事往往逸出常轨，要具了解之同情，是对学人见识与功力的极大考验。非有极高天赋，良好机缘，优越条件，并对此情有独钟者立志潜心，十年磨剑，难以奏功。可惜主观条件适合者别有天地，又不愿趋时逐流，偶以余力，只得片断。”附：桑大师为什么不写一写“鲁迅和孙中山”？
- 2、孙文看不懂古人注疏，看英文版来了解所谓传统文化。了解西方文明却只看流行地摊各种主义的烂货书。所言所论和现在网络上把本族奴隶主比作国家民族的弱智白痴一个样，动不动就中国领先几千年，中国几千年“先进”，中国古代民主先进至极之类脑残言论在孙文身上都可以找到渊源，孙文是两党脑残教育的源头，是网络弱智愤青的祖宗。而这样一个白痴伪造出来的东西竟然被当做历史神坛定论供奉百年，岂不笑话
- 3、政治史研究是桑老师的特长 此书展示了如何进行人物研究的新奇想法 很有嚼头 开头绪言更是让你欲罢不能
- 4、读的2001年版，就来标记一下。还好。
- 5、《也论孙中山与同盟会的成立——与何泽福同志商榷》

1、刊于《经济观察报》想必在两岸三地任何一个学校使用的历史教科书中，孙中山都是伟大的革命家、爱国者。但近年来，有台湾人开始将孙中山视为“外国人”，大陆人则给孙中山安上了各种“罪名”。举其大端，包括破坏立宪、刺杀宋教仁、发动“二次革命”、出卖东北，以及签订比“二十一条”更为苛刻的“中日密约”……关于孙中山“卖国”的研究尤其是上面所列的最后两条，说孙中山“卖国”，对很多人来说，简直是石破天惊，都以为是新世纪以来的重大发现。其实至少在二十年前，国内学界对这些问题都有了相当充分的讨论。中山大学的李吉奎教授在1996年出版的《孙中山与日本》中，即有一节谈“满蒙租让”计划，结论是“这种确定以领土主权的提供，去换取帝国主义援助的办法，不管动机如何，都至少不能认为是正当的办法”。对于孙中山与“二十一条”，李吉奎指出三点，一是孙中山表态暧昧，且指责黄兴批判“二十一条”是“讨好袁氏”；二是孙中山有意将提出“二十一条”的责任推给袁世凯，“不认为日本为交涉的主动者”；三是孙中山明知“二十一条”的危害性，却依旧坚持“只有先推倒袁氏统治才能消除外侮”。其结论是，“这种观点显然不能认为是正确的”。言下甚少为尊者讳的意味。还是1996年，南开大学的俞辛焯教授也有一本《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问世，其中一章是“孙中山的‘满洲借款’和《中日盟约》考释”。经过详尽论证，俞辛焯比较确信“满洲借款”的存在，他在书中说，这项借款“如变成现实，‘满洲’借款也用不着争论，对此问题的结论和评价也就大不相同，但毕竟未变成现实。”言下之意，割让满洲之事若是真的实行起来，孙中山无疑是“卖国”的，所幸此事并无结果。对《中日盟约》，他的看法是，资料不足，“对此真伪下结论也为时尚早”。相比之下，在孙中山所谓“卖国”的问题上，俞辛焯比李吉奎要保守些，他为“回护”孙中山，对孙与日本变幻莫测的关系，给出了一种相对有说服力的解释。众所周知，孙中山一生都在期望日本援助他的革命事业，又在很多时候，毫不留情地批评日本对中国侵略野心。传统上，中国学者习惯用“认识论”来解释这种矛盾——孙中山对日本侵华的认识，有一个不断加深的过程，故对日观点时常变化。俞辛焯更倾向拿国际关系视角来看待日孙关系，指出孙中山选择对日策略，依据的不是情感，而是利益。具体来说，1915年中日“二十一条”谈判前后，孙中山正流亡日本，若激烈批判日本，“将势必被赶出日本，对革命事业不利”。加之当时日本与袁世凯矛盾激化，孙中山更要“为打倒革命的头号敌人袁世凯，努力争取日本支持”。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孙中山已在广东建立了军政府，不再仰人鼻息，故严正表示“二十一条”是“差不多完全把中国主权让给日本了”“中国就要成了日本的附属国”。在山东问题上，孙中山则称，“日本可为强盗，吾国断不能与强盗交涉”。从前我们将孙中山“圣化”，让他身上没有一个污点，以至我们从没有真正将他视为一个政治家。但事实上，一方面如俞辛焯所言，“政治家对一个问题的态度和言论，可以随环境变迁而有所不同，这是政治家的一个共同特点。”另一方面，政治家在决策问题时，必然会有所取舍，有时为了更大的目标，不得不有所牺牲。如果用这个视角来审视孙中山，是不是能让我们对他多几分宽容？孙中山的“理想”与“现实”如果要更进一步理解孙中山的这种矛盾，不妨看看桑兵的两本新书——《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交流与对抗：近代中日关系史论》。说是新书，其实也只是桑兵前些年相关论文的合集。即使是作于十几年前的论文，现在看来，相较于市面上流行的各种人云亦云的通俗历史读物，依旧很有新意。在《孙中山的思想与活动》中收录的《信仰的理想主义与策略的实用主义——孙中山的政治性格特征》一文中，桑兵从历史、文化、心理等角度入手，尝试解读孙中山的复杂性格。他在文中所举的例子，即使在“黑孙”如潮的今天，也少为人所知。比如孙中山为让“夙抱帝王思想”的刘学询资助革命，甚至表示“主政一人，或称总统，或称帝王”；又如辛亥革命发生后，孙中山曾委托日本帮助建立中央银行，承诺给予发行纸币、办理国库收支、内外国债等特权。还是拿“中日密约”来说，桑兵对俞辛焯等学者的“技术性鉴定”不以为然，更倾向于相信确有其事，并视之为孙中山一生中“最为出格”的事。但他阐释了其“二十一条”的两点不同：一是动机不同，孙中山是为了革命，袁世凯则是为了称帝；第二是孙、袁所处地位不同，孙“仅仅是一种承诺，只有在日本援助中国革命成功的前提下，才能谈得上履行条约规定的义务”——革命成功了，会不会履行，也是未知数；袁世凯则不同，他是一国元首，签署的“二十一条”具有法律效应，国家主权一下就真的被卖了。简言之，孙中山出此现实主义的下策，为的依旧是革命理想，而非个人私欲。在桑兵的理解中，孙中山的政治性格有其双重性，一方面是以上列举的实用主义行动，另一方面则是当之无愧的政治理想主义者——不屈不挠地追求民主共和长达40年。在孙中山身上，“理想主义引导着实用主义方向，制约着实用主义的范围和程度；实用主义探索着通往理想境界的千途万径，形成跨

## 《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

越理想与现实之间鸿沟的桥梁。”在某种意义上，桑兵与上述俞辛焯的解释其实殊路同归。孙中山怀有革命理想，而又无所凭依，只能通过不断变换盟友，以实用主义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标。桑兵就此判断，“孙中山对其政治思想愈是笃信，其实用倾向的幅度也就愈大”，竟至给人不择手段的印象。但孙中山一切行为的出发点，都是为在中国实现共和，他相信在这之后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一举收回失去的权利、领土。在《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这本书中，桑兵还研究了孙中山与同盟会、胡适、传统文化等问题，无不给出充足的史料、可信的结论。《交流与对抗：近代中日关系史论》中《排日移民法案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解读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演讲的真意》两章，则厘清了孙中山提出大亚洲主义的前因后果，堪为其对日观念的“盖棺定论”——期望说服日本放弃对华侵略政策，转而援助中国，实现亚洲独立。关于孙中山“卖国”意图的种种事迹，史料确凿，辩无可辩。这些问题的是非，自是不妨见仁见智。恰如桑兵说的那样，“孙中山不会因为一些污点的存在而失去其革命家、爱国者的光彩，没有必要多此一举地善意掩饰或曲意辩解。”无论孙中山是革命家，还是政治家，作为一个人，都会犯错，不能因为这些并未造成真正损失的错误，而否定他一生的努力。在我看来，已经到了给孙中山“平反”的时候。

### 1、《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的笔记-第1页

吾友移席某市，相见称，彼处凡学历史者皆不治史，凡治史者皆非学史出身。闻言感慨万端，此实将近来学界的种种弊端一语道破。时下一些学人对本行现状多有不满，或归咎于故人，或借鉴于别科，于是赶超前贤，跨越学科之说甚嚣尘上。至于如何超与跨，无非以立异为创新，在本学科以不知为无有，在他学科以不懂为新奇。所欲超越者，多半为必不可少而尚未掌握的行规，则标新立异不过是越矩违规。此类言行，看似好标高的，胆大妄为，实则内里空虚，对已知不自信，对未知则盲从，究其实，还是学问未上轨道。

治学须在技术层面以上才能发挥个性，若以规矩为束缚，则门径已成局限。近年来不少学科的学人不安于位，愚意原因还在对本学科的基本规矩知之不深，所以易于动摇。以史而论，不知如何弄清史实，便欲纵论史识史鉴，如此不温故而欲创新，难免半桶水之妄。而无知者无畏，读书越少越放言无忌，与前贤读书越多越不敢说话适成反证。世风亦推波助澜，或自命权威，或诩为典范，以为站在侏儒身上便成了大师。又惟恐别人不认，复设立奖项称号，诏告天下，功成名就，以期不朽。为学者因而不在于学术建树方面争久远，唯争一时名利之得失，关起门来水准越评越高，放之四海则难免每况愈下，自欺欺人之举在学术界或有泛滥成灾之虞。据说某市曾有“到本世纪末”引进和培养大师各10人的宏伟计划，如今新千年早已来临，大师却踪影杳然。

上述现象，晚清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来愈演愈烈，究其原因，中学在与西学的冲突中日益失势至关重要。中学无本，则学术多由外来，本既在外，不易知其详，人类天性又趋易避难，学人复好新奇而畏艰深，加之传媒哄抬，学子风从，游谈无根之说自然大行其道。本来学问之事讲究天赋和训练，最不适于多数取决，必以此定学问之优劣得失，决无政治民主的两害相权取其轻与纠错效果，只能在人多势众的喧闹中使民族的智慧流于平庸。

历史研究，政治史本为传统正史的主体，在欧洲近代学术变迁中，则是变革的主要对象之一。近代中国的新史学兴，正史自然受到冲击。到1924年，章太炎已经批评时人治史受日本东洋史学的影响，“重文学而轻政事”，“详于文化而略于政治”。随着历次革命的凯歌式进行，政治史再度成为学人关注的重心，只是偏于事件。革命结束后，以革命史为中心和归宿的政治史又逐渐冷却。20世纪中国诸如此类的循环不仅随处可见，而且多次重复。至今恐怕很少有人回味渐入颓唐的章太炎的言论。由有学问的革命家退居宁静的学者，政治上逐渐淡出前台，思想上也趋于保守，学术的思考反而因此能够避免过度的情绪化，在西学大潮排山倒海般涌来之际，强调民族固有的特性，是非正误姑且不论，整体上可与新文化互补，当是不争的事实。研治中国史事，不能不受历史进程和资料遗存样态的制约，重政事适为表现之一。中国历史文化一以贯之，制度史自然受到格外重视。而在常态的社会史研究之外，重大事件和人物研究肯定会魅力永存。时下外行介入，主要即在这类领域。

治史学如弄文学，做什么固费斟酌，怎样做尤其重要。时人好从选题区分宏观与微观，其实做什么虽然具体，怎样做却能举一反三。治史目的首在求真，但在重建史实的过程中，所揭示的决不仅仅限于史实的真伪。“讲宋学，做汉学”一途，最要在所做工夫均能体现微言大义，而又处处皆得证实。离开史学专谈史法，难免两面脱节，流于空泛。即使有必要建立新的解释框架，也应通过一定的具体研究表现出来。所以，同一题目出自不同人之手，格调品味，高下有别。以成果分，品类有四，曰不看也知，一看便知，看到即知，看也不知。

所谓不看也知，其选题便不能成立，堕入学术陷阱，即使自圆其说，也离事实真相愈远。一看便知者，能将所见材料排列，或叙述人事之大体，或分析问题各方面，虽无新意，尚不越矩。此类切忌以前人尚无系统专门研究等语自我标榜，因所说已为前贤分别道出，或在意料之中，虽无专篇，或系唾余。看到即知，指其专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又有上下之别，上焉者以新材料贯通旧材料，识一字成活一片，开创新解，纠正陈说。下焉者乘空蹈隙，求新奇而偏一隅，以琐碎为发现。看也不知者，所用

## 《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

虽常见材料，其大能够融会贯穿，通方知类，其小可以读书得间，力透纸背，均能发人未发之覆。极高明者，甚至将所用材料一一列出，亦看不出所以然，必经其人讲解论述，指点迷津，方能豁然开朗。除第一类外，其余均在水准之上，但最后一类若不写出或讲出，则重复发明可遇而不可求。或以为学人著述不在乎多一本少一本，一般而言固然，至于做到极高明者，才识机缘，均赖天成，如不在为己之后为人，则不知何时能有继起者悟出，实为学界难以弥补的损失。学术之事，能增加量的扩张已十分困难，要在质的提升方面有所建树，谈何容易？

入门以来，便与孙中山研究剪不断，理还乱。近25年来，适逢孙中山研究经历由“险学”而“显学”的转变，进展显而易见，成果的量极多，面极宽，要找一规模合适又有深度的方向已成棘手难题。但所谓盛极而衰，祸福相倚，中兴里潜伏着危机。其一，从冷变热，吸引了不少学人的关注，也不免成为争食的饭碗，而在量的扩张的同时，质便做了牺牲，低水平的重复不在少数。其二，碗小而僧多，要不断扩大容量，容易流于偏斜，如红学之末流。其三，凡附加许多社会责任之学，往往有些不堪重负，学人反而视为畏途，不愿虚耗精力。如此一来，流品混杂，学术难免等而下之。

平心而论，尽管孙中山研究硕果累累，整体上仍未能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倒不是用国际拿破仑研究已有传记千余种作为参照，这样的杰出人物无疑会不断成为史家乃至社会重新认识的对象，就学术言，至少有几点可以讨论：一、迄今为止，无论国内抑或海外，已出的孙中山全传中尚无一种得到学界的公认。撇开观念的差异，仅以深入程度论，后续各书恐怕还不及史扶邻1968年的《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二、既有成果中误读错解孙中山思想言行者即使不能说比比皆是，也为数不少，还有相当多的部分虽有论点，论据却未经过严格检验，或者只是按照后来的外在观念，为孙中山重塑金身。三、已有的资料很多地方读不懂，当然不是指字面的意思，而是相关的人事及所指，强作解人不过是望文生义。随着新史料的问世，识一字成活一片的情形随时可见。凡此种种，均说明相关研究尚属幼稚。

棘手与幼稚，看似相悖，实则相通，这也正是人物研究的特性。据说上一世纪70年代美国的中国学界中，凡找不到适当题目又想有把握获得博士学位者，就会以人物研究为捷径。其实，人物研究上手较易，做好却极难。因为不能仅仅描述外形，还要对其言行具了解之同情。这种所谓了解同情，绝非时下等而下之的心理分析之类，用后来的外在观念妄度前人，而要以实证虚，通过了解前后左右的人事及其内在联系，具体掌握其每一言行的殊境、思维、潜意识甚至无意识，不以一人之是非为是非，以免诛心臆测。更有甚者，或认为要了解历史人物，须在相关的知识和智慧方面超越对象，否则难以返其本心。孙中山这类人物，时间跨度大，经历事件多，交往联系广，又兼具政治家、思想家等多种品格，经验与智慧均为常人所不及，为人行事往往逸出常轨，要具了解之同情，是对学人见识与功力的极大考验。非有极高天赋，良好机缘，优越条件，并对此情有独钟者立志潜心，十年磨剑，难以奏功。可惜主观条件适合者别有天地，又不愿趋时逐流，偶以余力，只得片断。

治史初窥门径以来，就在以孙中山研究为主业的机构，所谓在商言商，陆续也做了一些工夫。尤以在陈锡祺先生主持下编辑《孙中山年谱长编》，受到的训练最大，而且得益不限于孙中山研究。凡治一人一事，如有长编、纪事本末和考异为基础，必能得心应手，游刃有余。而要做足这些工夫，一人一事亦戛戛乎其难。今人有一绝大误会，以为近代史料易读，治学难度较古代史为低，其实大谬不然。以史料言，陈垣力求竭泽而渔，而近代史料浩繁，无法穷尽。以史学言，陈寅恪治中古史重在制度文化，治晚近史则深入心境，要以实证虚，艰辛也在信而有征之上。所以，编过《长编》之后，愈知不可轻易出手。其时有一撰写孙中山传的计划，得几位师友相邀，分工合作，即主张规模宜稍大，详尽之后，继以简约，则判断才不至于偏误。所承担1895至1911年一段，写到庚子，已逾10万言。后来这一计划因故搁置，心得分别写成单篇论文，或融入其他著述。10年来治庚子勤王史事，实由此发端。本书的几章，亦为副产品。同样受编辑《长编》的影响，关于孙中山与同盟会成立的过程，也是关注的重心之一。

治史切忌为成见所囿，先入为主。从定义出发，或以某人立场为据，均违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正道。而人物研究中，上述正是较为常见的偏弊。有时论战双方看似针锋相对，或维护，或翻案，其实背

## 《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

后的思维认识方式基本一致。有关《孙中山与庚子勤王运动》和《陈炯明事变前后的胡适与孙中山》的讨论，很想由前后左右的关系入手，把握当事人的言行，避免以主观设定的标准衡量评价。从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中看出所谓规律，远比牺牲史实得出概念化的论断来得重要。

本书收录的各文，或已经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陆续发表，或成稿有年，未曾面世，或为近期写作。已刊者当时或有手眼不到，因而致误之处，此后材料多见新出，随时有所签注，认识也有局部调整，汇集时均做程度不同的增改订正，有的增加篇幅较原来多出数倍，几近重写。这倒不是悔其少作，故意毁尸灭迹，而是想反映自己认识的进展。其中《孙中山与同盟会的成立》和《信仰的理想主义和策略的实用主义——论孙中山的政治性格特征》两文，颇为犹疑。前者为与人商榷之作，章开沅师后来曾教以治学宜正面立论，不宜对面争论，虽然不一定针对此文，却无异于当头棒喝。凡对面争论者，其始既为对方制约局限，其终往任意气用事，走向偏激。双方论点针锋相对，唇枪舌剑，而观念和认知方式如出一辙。后者则因为稍前史扶邻教授在台湾的一次研讨会上提出过论点相同，论证较略的论文，限于条件，当时未曾寓目，加以论证方式与目前信守的办法略有出入。另外，《孙中山与新加坡华侨》本来是为了一本孙中山与华侨的专书所拟的一章，其体例要求不用注释，后来因故搁置。现尽量补回注释，疏漏在所难免。

本书各文在搜集资料、研究和写作过程中，得到中村义、狭间直树、久保田文次、吕芳上、王学庄、容应萸、朱英、胡波以及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各位师友多方面的帮助，谨此致谢。

# 《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

##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http://www.tushu111.com)